

【论 文】

中国大陆地区“三区革命”史研究概述¹

文志勇²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中国大陆地区“三区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相关著述。早期的研究成果虽属起步阶段，但多为谙知内情人士所写，当时人记当时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立论也较客观冷静，很多论断已逼近事件的本质，对当今研究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视野和深度逐步拓展，学者们从各种回忆录和档案材料中不断发掘，充实论点，从革命史、地方史、国际关系史和军事史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一事件，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结论，部分结论重新向早期论断回归。但限于种种原因，深入严谨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尚不多见，尤其对军事方面的内容，缺乏细致的梳理和推导，很多既定的说法存在问题，有必要继续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新疆；三区革命；学术史

“伊犁事变”即现在官方所称“三区革命”中的伊犁革命之旧称，是中国新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当今诸多新疆问题之源头，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影响力。多年来，学者和各界人士对这段历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广泛观察和研究，撰写出大量的记述和研究成果，但限于篇幅和作者的搜集能力，只能摘要概述。

一、早期重要的记述与研究

关于伊犁事变，最直接的记录自然是当时的档案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原始记录已散失或禁止查阅，学界只能从张大军、吴忠信及档案汇编之类的著作中了解相关的信息。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看，最早的记载当属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所著的《主新日记》（从1944年8月到1946年3月）。这是他私人日记中的一部分。有些内容因过于真实和敏感，因“牵涉范围过广，如予公开，顾虑之处甚多……对中央，对地方，均将有不良反应，对吴公个人之清誉，或亦易被误解”。后来周昆田在抄录整理该日记时，做了很多删剪拼合，却一直未公开发表，1999年才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节录出版，2006年又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中影印出版。³日记对伊犁事变的起源、发生和演变过程，苏联代表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军政人士对事件的认识变化、应对措施及实施效果，新疆各界民众的态度、表现与分化，都有真实而详尽的记述。尤其珍贵的是，大量的公文、电报、信函、重要谈话和军政决策内幕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对后世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问题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他认为伊犁事变发生的原因在于过去所种恶因太多、外力内蚀和本身力量不足，解决之道在于调整中苏外交并以国家力量经营新疆。

国内最早的研究著作有《伊宁事变纪略》和《新疆十年》。⁴前者是事件爆发后，由重庆派赴新疆学院任教的陈力在广泛搜集官方档案和新闻报导，采访事件幸存者和知情人撰写完成的一篇

¹ 本文刊发于《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1-138页。

² 作者为民族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教师，从事西北民族文献及历史研究。

³ 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五）；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30-37册。引文参见周昆田之序言。

⁴ 陈力：《伊犁事变纪略》，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年。周东郊：《新疆十年》，兰州和



长文，声称他只是不加一丝感情成份地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实则不满于内战烽火遍野、新疆动荡不安及东南人心麻木的现状，呼吁中华民族“注目这昆仑故乡”。他认为事变发生的原因在于政治脱节、社会失调、经济濒于崩溃、军力空虚，加上外力支持，潜在的民族革命运动激流于是迸发，指责吴忠信接掌新疆后的政策是“因循、无能、麻痹、落伍的逆时之流，日与年高德勋的阿洪们宴会往来，而把一些受有近代潮流影响的青年丢在脑后”。¹后者是饱经浮沉、劫后余生的东北人周东郊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警务处工作时有机会查阅官方公文档案之便利，搜罗各种资料完成的一部专著，对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社会发生深刻嬗变进行全面论述与反思，观察冷静，立论公允，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寄予同情，对中国传统的治边模式提出质疑。他把伊犁事变发生的根源归结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再觉醒与国际的支援，认为伊犁的土著维吾尔族百余年来有着反汉人统治的思想与活动，他们不甘心永远在异民族的统治下生活。外力亟谋染指并囊括新疆，在新疆地方民族中进行并加强煽惑与拉拢工作。新疆地方民族知本身力量有限，也乐于接受外来的支援，为自己创造新的历史。²

综观此一时期的代表著述，虽属研究起步阶段，但多为谙知内情人士所写，当时人记当时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立论也较为客观冷静，很多论断已逼近事件的本质，对当今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建国以后前 50 年的代表性著述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 30 年对该课题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仅有少量资料汇编出版，如《新疆的革命运动与暴乱事件》、《新疆历史资料》、《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以及无出版信息的油印本《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共 8 册）等。³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改善与学者们的执着追求，纪大椿等人呼吁对三区革命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不应再沉默隐瞒下去，研究重新起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后来，作为对这个呼吁的实践，他广泛搜集资料，依据当事人的回忆与座谈记录及海外相关著述，对苏联支持和控制三区政权的事实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披露，观点独到大胆而富有预见与启发性⁴。

1988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若干中央高层人士的指示下，编写出版了《新疆简史》第三卷，具有开创意义。⁵但在三区革命的记述和评价上，限于当时的环境与认识分歧，在对该段历史的研究还尚属禁区、雷区的情况下，它回避或修改了某些重要的史实，⁶完全依照爱国、统一、团结、反抗压迫的革命史范式，严格遵循中共党内多年来的规定性提法，将其描述为“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先进分子

平书局油印本，1948 年；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北京线装书局 2006 年，第 29 册。

¹ 陈力：《伊犁事变纪略》，上海正中书局，1948 年，第 10 页。

² 参见周东郊：《新疆十年》，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北京线装书局 2006 年，第 29 册，第 353-354 页。

³ 《新疆的革命运动与暴乱事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1 年。《新疆历史资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1963 年。另外还有该单位编选的多辑本《新疆历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4 辑。《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共 8 册，油印本，无出版信息，但据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 册，第 352 页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350 页所引材料综合判断，乃 1958 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

⁴ 参见纪大椿：《三区革命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 年第 4 期，第 31-33 页。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89-213 页。

⁵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2 册；1988 年，第 3 册。

⁶ “新疆简史”第三册编写组：《撰写“新疆简史”第三册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导思想》，《新疆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1-6 页；蔡锦松：《五年磨一剑——“新疆简史”第三册编纂出版过程述略》，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347-355 页。



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胜利的配合下，在斯大林领导时代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精神、物质等方面支持下，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苏联几次出兵新疆的事实，它也作了一厢情愿的解释，认为苏联对新疆没有领土野心，它只要求新疆能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权，以便发展双方的经济和文化等，似乎忘了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之殷鉴。在史料的选裁上，因为利用了吴忠信《主新日记》、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等一批新的、很有份量的史料，可信度大大提高，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把国民政府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收拢民心、稳定边疆的种种措施，都予以否定和嘲讽。对史料的分析和引用也存在不够准确的现象，对引用的周东郊在事件论述上的某些错误也未予纠正。如伊宁事变前邓翔海飞赴伊宁进行宣慰，当时他的任务确实只是宣慰和调查，而该书依据事变后邓翔海的辩解声称：“宣慰只是表面文章，在暗中他已准备好控制各族头目，宣抚训练壮丁、组织自卫队、悬赏奖励人民自动捕匪、积极清乡，并令警察及保安队一体协助军队剿匪。”¹这不过是官场上的空话而已，只要对照当时吴忠信、刘秉德和塔里海提等人的谈话报告，就十分清楚了，况且假如这些措施真的付诸实施的话，伊宁事变将随之延宕是可以确定的。对吴忠信到任伊时于1944年10月6日召开的省厅委谈话会，不过是对省情的初步了解。据吴忠信记载，议题中心为“涉外关系、匪患及经济等三大问题”，虽也有对阿山哈萨克族暴动武装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但重点仍在于招抚，²而不是像该书描述的那样杀气腾腾³。这不是吴忠信为人处事的一贯风格，更与他的主新政策相抵牾。至于各县自卫队的整顿，那都是事变后的应急措施，而非当时。对省军事当局的所谓五路进兵计划，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因在后文中还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言。对天山中间一些重要的关口名称，也仅仅是照抄原文，没有标注，使人无法弄清它们的具体位置。

依据同样原则撰写完成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和《新疆三区革命史》所存在问题也一如《新疆简史》。陈慧生与陈超合编的另一部专著《民国新疆史》也有同样的问题，⁴且有明显的堆砌材料、行文仓促、衔接不畅之感。虽然在苏联与三区政权的关系问题上比以往有了很大突破，实际上已经用事实点明了苏联的幕后操控。其引证材料也远远超过前者，甚至包括档案材料及民族政权所出的报刊翻译和当事人的回忆口述等。相隔4年之后编写的“革命史”甚至对“大事记”中夸张描述民族武装袭扰政府军战果的手法作了笼统化的修正，向尊重史实迈出可喜的一步，但遗憾的是未遵守学术规范，基本未予标注或标注甚少，使人不辨真伪，而且其中还存在着很多明显的错误。⁵如1944年前后伊犁的物价涨幅问题就尚待继续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结论。阿山游击队正式成立的时间也不是1944年4月而是早在1943年12月“阿山哈族复兴委员会”成立之时。巩哈暴动的时间不是8月17日而是9月19日。当时法提合向牧民们宣称要在肉孜节开始暴动。据查，1944年的肉孜节系公历9月19日，农历八月初三，伊斯兰教历1363年10月1日。《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亦曰：8月17日法提合等人借肉孜节做礼拜之机，在清真寺商量武装起事。县警察局接到密报，前去搜捕。法提合闻讯率众伏击，巩哈暴动从此开始。⁶《新疆简史》、《新疆三区革命史》、《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等基本上沿习了这一说法。既然肉孜节是9月19日而非8月17日，那么法提合率众暴动的时间就很可能是在9月而不是8月。事变前政府驻伊犁军队的数量问题，也缺乏详细考证，可以说凡涉及到军事问题，总是错谬百出。另外，刘秉德从未担任过伊犁专区代理专员，当时的代理专员是区警察局长高伟。阿山的太平贝子是蒙古族而不

¹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册，第357页。

² 参见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4年10月6日。

³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册，第377页。

⁴ 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6-400页。

⁵ 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18、19、20页。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引言，第2页；正文第8、23-24页。

⁶ 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是哈萨克族。《三民主义》更不是什么反动著作。对于“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旗帜颜色与式样方面的描述，也与广禄、塔里海提等人所说不同，更与后来的介绍不同。吊诡的是，与1933年11月在喀什成立的新疆第一个民族分裂政权“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任命总统、总理、各部部长相比较，这些著作在谈到伊犁民族武装初步胜利之后筹建临时政府时，一律以省级单位“厅”来相称，首脑则以可大可小的“主席”相称，难道他们早就预知在独立运动之后，仍要归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重新查阅和翻译原始文献。在谈到“民族军”成立之后的“三线作战计划”时，把北、中线作战目的说成是攻城夺地，而把南线作战仅说成是宣传、配合与牵制，有着明显的倒果为因的痕迹。令人怀疑苏联制定的原作战计划是否真的如此。更为离谱的是，“革命史”中在谈到盛世才政府的“献马运动”时竟这样说道：“1943年3月，盛世才政府下令要各族人民捐献一万匹军马，若无力献马者则须交纳高出市价一倍的现金，否则即要被官府投入监狱，直到交足现金后才能放出。”¹首先它在逻辑上有很大问题。新疆伊犁、塔城、阿山地区产马。家中无马者，与其缴纳高于市价一倍的现金，不如转身到巴扎集市上购买马匹。这是人人都会算的一笔账。其次它没有查阅原始档案，也没有参考已有的观点。《新疆简史》中明确表述：“如无力捐马，则须缴纳高于市价二分之一的马价。”²二者对错一目了然。

也有例外的情况，如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的《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1912-1949年）》，在继续遵从以往原则的框架下，开始大量引用文史资料、地方档案及口述回忆，在论据方面更加充实，注释也开始走向学术规范，对事件的分析、人物的评价以及苏联与三区政权的关系问题，都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按着作者的自我评价“皆有新意”。³

令人费解的是伊犁民族政权的名称翻译。据统计，迄今大约有4种不同的译法：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1. 《主新日记》、《伊宁事变纪略》、《新疆风暴七十年》、《张治中回忆录》、《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三区革命大事记》都记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⁴

2. 《新疆十年》、《新疆的革命运动与暴乱事件1911—1949》、《新疆五十年》、《新疆简史》都记作“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⁵

3. 《天山雄鹰——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生平》、《赛福鼎回忆录》分别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⁶

4. 《“双泛”研究译丛》、《新疆三区革命史》、《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均译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⁷

不知为何，自20世纪90年代起，从新疆社会科学院开始，突然间都通译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且未见任何解释。很多人认为旧译不确切，并将史料原文也统统改动。其实，根据词源，

¹ 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²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册，第3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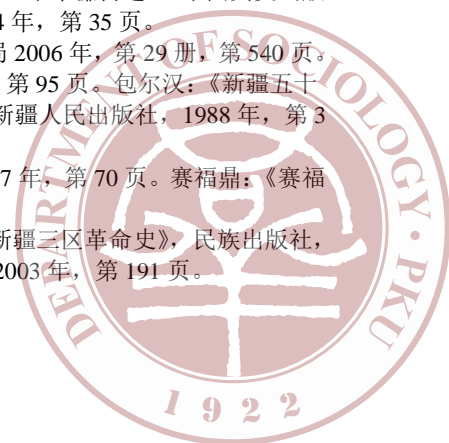
³ 白振声、鲤渊信一：《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1912-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评语参见内容提要。

⁴ 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4年12月12日。陈力：《伊宁事变纪略》，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第18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第6270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418页。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编委会：《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⁵ 周东郊：《新疆十年》，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29册，第540页。《新疆的革命运动与暴乱事件1911-1949》，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1年，第95页。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1页。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册，第368页。

⁶ 赛福鼎：《天山雄鹰——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0页。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⁷ 《“双泛”研究译丛》，新疆社会科学院，1991年，第1辑，前言。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40页。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俄文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东土耳其斯坦）中的 туркестан 与 турки（土耳其人）属同根词，而突厥人则用 тюрки 表示，历史上新疆也不属于东突厥所控制，况且泛突厥主义者号召建立的联盟“土兰”也是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核心，以哈里发为领袖，以全部操突厥语民族为国民，所以旧译也自有其道理。笔者推测，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府顾及到土耳其凯末尔政府曾公开声明不支持泛突厥主义，为撇清关系；同时泛突厥主义分子也为了尽力上溯自己的历史以表示其合理性，始有“东突厥斯坦”的汉文译法。但这个汉译名称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三、世纪之所呈现的研究新动向

世纪之交，新疆史研究迸发出新的光彩，研究视野和深度有了进一步拓展。沈志华撰写的《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利用中外档案、历史资料及采访记录等，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轨迹并分析其成因。¹他认为：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十分微妙，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变化无常，时而与地方政府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鼓动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表示强硬，时而倾向缓和；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根本目标是保持战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苏联在新疆地区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影响。在战后对华政策中，就其重要性而言，新疆排在外蒙古和东北之后，故而成为苏联调整对华关系的外交筹码，这正是苏联对新疆政策时常改变的基本原因。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的话，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他引用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话说：“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他不同意朱培民、薛衔天等人提出的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是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这一说法，认为苏联出于对远东国际局势的考虑，恰恰是为了促成中苏条约的签订而改变对新疆政策的策略，即策划三区革命、支持新疆独立和主张和平谈判都是莫斯科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外交筹码。苏联阻止新疆独立，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不对外扩张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给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的控制。苏联绝不允许别人，包括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插手三区事务。后来，苏联把新疆作为礼物奉献给新盟友中共，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接受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既成事实，同时也使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台湾学者吴启讷高度评价本文，认为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在伊宁事变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首度突破中共官方于 1990 年代之前所划设的政治界限，而与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界获致近似的见解。但同时他又表示，将 1940 年代后期新疆政治的变化归诸苏联干涉，多少仍忽略了维吾尔主义本身复杂演变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²而笔者以为，苏联之所以将新疆排在外蒙古和东北之后，并非认为是新疆对它不够重要，而是因为苏联对控制新疆充满了自信，它可以利用自身的种种便利随时对新疆施加特殊影响。

厉声在他的《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一书和其后的会议论文《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中³，一方面坚称新疆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反抗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

¹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3-242页。

² 参见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1期，第149-184页。

³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厉声：《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二辑，第370-382页。



剥削、压迫的武装斗争，而运动初期形成的分裂政权只是少数封建宗教上层分子违背广大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动行径，是注定要失败的，人民一旦觉醒，便会同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最终在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的领导下，摆脱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汇入革命洪流，维护国家统一，迎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另一方面，作者用大量俄国档案充分证明了苏联在三区革命中的全面主导和支撑作用，揭示从 1919 年起，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提出的“东方革命论”，就有在新疆点燃革命火焰的欲望。他们把新疆的军阀政府定性为汉人殖民统治，把人民的反抗暴动理解为“民族解放运动”。这种错位的认识在苏联高层始终存在，并在特定的条件下占据上风，左右苏联的对新疆政策，这是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东突”分裂政权产生的思想根源之一。苏联对三区革命的发动、发展、巩固及转变，有着全方位的支持、参与和完全的操控能力。雅尔塔会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方向做出调整，从全力支持地方民族争取独立转变为在维护国民政府对新疆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更换运动领导人，促成其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使伊犁、塔城、阿山又恢复到新疆省辖的行政区地位。作者强调在研究时要把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少数封建上层的分裂活动、把革命运动与寄生其中的分裂政权严格区分开来。这种双线式的论述导致无法弥合的内在矛盾，苏联与伊宁政权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合理阐释，三区斗争远非革命与反动、统一与分裂所能涵盖，复杂的民族主义没有被提及，对“二次革命”的解释过于牵强，竭力拔高地方民族人士的作用并不能掩盖苏联政府的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这是更深、更广、更高层面的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称的取消与阿合买提江等人掌握三区领导权力誉之为“20 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恐怕也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另外，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特别行动司司长耶格纳洛夫将军既是整个行动的策划领导人，又是苏联驻伊宁政府军事顾问团负责人，¹而作者因将他的全名分开使用，易使人误认为是不同的两人。²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薛衔天的论文《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和专著《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当中，³它妨碍了作者学术思想的充分发挥，比如为了突出革命者的领导地位，曲意把阿巴索夫说成是伊宁游击队的组建者和领导人，并称声游击队是伊宁暴动的主力。又例如在谈到“东突”临时政权时说：在三区革命起来之后，艾里汗吐列控制了革命领导权，不仅成为“双泛”主义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把封建宗教上层的参与看成是分裂政权出现的主要原因，似乎分裂主义思想只存在于这些人的头脑当中，与其他人无关。但档案证明：“如果未经与苏联外交官和苏联驻该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协商，无论是该政府成员，还是主席艾里汗吐列本人，不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在国家建设问题上，都不能采取少许重要的步骤。”⁴该论著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探讨了中亚民族因素对苏联调整对新疆政策的重大影响，并为学界研究相关专题、揭示历史真相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苏联档案材料及其线索。他认为：苏联调停三区与国民政府和解既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也是为了解除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中亚地区的威胁。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苏联共产党始终把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看成自己的最高使命，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际法准则相违背，势必会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由于主客

¹ В.А.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ГПУ., 1999г., стр.78-79.

² 参见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96-197 页。厉声：《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二辑，第 376 页。

³ 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68-74 页。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下），第 125-158 页。

⁴ В.А.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ГПУ., 1999г.,



观条件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会执行务实政策来维护国家利益。换言之，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时，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内。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时始终存在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发动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

在盛世才与苏联反目之前，由于新疆省当局一直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所以苏联高层在对新疆问题上，也一直是务实派占主导地位，执行传统的基本政策，并经受了几次大的考验。其基本政策的内容是：只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得到保障，就不支持新疆独立，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不管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都与新疆省政府打交道（向着汉人），而不与地方民族势力打交道（不向着穆斯林）；只要新疆地方政权不反苏，执行对苏友好睦邻政策，就积极与其发展经贸关系，支持这个政权存在。而世界革命派则坚决反对苏联帮助新疆省政府镇压地方民族运动，他们的理由是：“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

盛世才的反目与投归国民政府使苏联领导人转而采纳激进派的意见，决定推翻盛世才统治。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的真正的革命者掀起民族革命，“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边界筑起一道长城。”但苏联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而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于是苏联又放弃激进政策，重新向传统政策靠拢。

引人注目的是，王登欣在《苏新关系与“三区革命”新论》中，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行新疆史著及学校教材把自伊宁事变以来的暴动都通称为三区革命的定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绝不能把苏联的军事入侵说成是援助、把伊宁事变说成是人民起义，把东土国说成是革命政权；绝不容许用主流、支流，既有、也有，主观、客观来进行辩解。他明确表示，苏联策动伊宁事变，制造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在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下，苏联被迫改变对新疆的侵略方针。经过和平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伊、塔、阿三区和民族军才回到中国人手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盟的成立标志着三区人民的斗争融入了中国革命的大潮，从这时起，方可称作三区革命。¹

关于三区武装斗争方面的专题研究，有杜瀚《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斗争》。²文章分析了三区方面军事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应当吸取的教训，认为三区革命的发展中军事斗争起决定作用，成功的原因：一是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支持；二是得到苏联的大力指导和帮助；三是做了长期的准备，选择了有利的时机和地域；四是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计划，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教训是运动初期发生了民族分裂主义倾向和反汉错误。他认为，苏联支持阿山和清犁的武装暴动

стр.79.

¹ 王登欣：《苏新关系与“三区革命”新论》，《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27-32页；2003年第2期，14-18页，连载。

² 杜瀚：《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斗争》，《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第35-41页。



是为了吸引省政府的注意力，使其产生错觉，从而为巩哈暴动创造有利条件；而巩哈暴动又是为了吸引省当局在伊犁的军事力量，造成伊宁空虚，然后乘机暴动。但事实上，在阿山暴动时，苏联还没有确定对新疆的军事计划，所以此论断前半部分有过度诠释之嫌，尚需商榷。而且，苏联选择伊犁作为暴动的突破口，不仅仅是因为伊犁与苏联的关系较密切，因为伊犁、塔城、阿山、喀什沿边各地与苏联的关系都很密切，苏联在南疆境外也建立了暴动策划组织，那么苏联为什么不在阿山乌斯满武装或蒲犁伊斯哈克别克游击队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声势和影响力而转向伊犁另打天下？除了乌斯满难以驾驭和阿山经济薄弱、影响力不大以外，肯定还有其他的隐衷。另外，他认为在事变时，绥定驻有旧省军骑 1 师的部队，但缺乏相关的史料根据。

他的另一篇文章《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严格遵循官方定义的前提下论述了三区革命的起因及伊宁政权与苏联、中共之间的关系问题。¹作者主要运用《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和《新疆三区革命史》的材料来证明以下三点：盛世才政权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压迫是三区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苏联的组织策划是三区革命发生的直接推动力；中共对三区革命有重要的影响；重点突出苏联对三区政府的全面掌控，后来又围绕本国利益目标的获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将对华及对新疆政策分别作出调整。

曹国芳在《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的兴起》一文中也对苏联与三区革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新疆三区革命是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各族人民为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掀起的一场争取民族平等和阶级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内地的人民解放战争，这场运动是在苏联的直接策动、组织和支持下发生和发展的，兴起的每一个环节都与苏联在新疆的政策和行动密不可分，苏联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使三区革命一经发动就迅速演变为摇撼新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巨浪。他把三区运动发生的背景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民族矛盾尖锐，二是盛苏关系大起大落。围绕这一主题，他先后在另外三篇论文中指出，苏联藉帮助盛世才之际，对新疆进行渗透控制，并从新疆获取大量特殊权益，最终要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这与依靠苏联来建立和巩固个人独裁统治的盛世才之间存在着关系破裂的必然趋势。后来，他又把此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及实施明确描述为“步步递进的、侵略性、离间性和颠覆性行动”，导致新疆边境局势紧张、混乱和激荡。²但是我们也发现，他的文章存在着史料引用比较单一、多篇文章观点基本相同的问题。另外，他认为 1944 年伊宁解放组织的活动与其他地方的解放组织相比是最为活跃的，多少有一些倒果为因的味道。

邵玮楠在《动荡之源：再论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及《动荡之源：新疆三区革命的国际背景》中，³把以往学界对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探讨归结为三种主要观点：一是苏联主使，以纪大椿、沈志华、曹国芳等学者的观点为典型；二是盛世才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朱培民、徐玉圻等人的观点为代表；⁴三是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主义的传播，比如西方学者林达·本森在《伊犁起义：穆斯林对中国新疆当局的挑战，1944-1949》一书中的观点。⁵她认为这三种观点都仅指出了部分原因，且过多地把目光投射在了新疆与苏联本身。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研究这一时期的新

¹ 杜瀚、杜飞舟：《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34-44 页。

² 曹国芳：《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的兴起》，《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第 41-45 页。曹国芳、朱佐山：《论三、四十年代苏联政府对新疆政策的演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第 38-41 页。曹国芳、杨英健：《援助，还是攫取？——1933-1942 年苏联对新疆之政策述论》，《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第 52-57 页。曹国芳：《苏联与三区革命前夕新疆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123-127 页。

³ 邵玮楠：《动荡之源：再论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2012 年 3 月 24 日“第八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会议论文；其后，作者在基本观点未变的情况下，对此文作了精减和修改后公开发表，见邵玮楠：《动荡之源：新疆三区革命的国际背景》，《西域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7-48 页。

⁴ 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 年。

⁵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0.



疆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新疆地方和苏联，更要考量其后的国际背景，同时还要注意到历史事件的发生有一个长期积累演化的过程。简而言之，她的观点是：二战时期前后十多年间，新疆是一个中苏美新三国四方势力角逐的舞台；苏联不甘心失去在新疆的利益，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美国挺进新疆，成功地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该文的偏颇之处在于，沈志华、曹国芳等人的观点并不是只强调苏联的主使，同样也涉及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比如美国的介入，而苏联的主导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便是像朱培民、徐玉圻这样恪守革命史撰写范式的学者，也不会把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化成一点，也还是要强调民族先进分子的领导、苏联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既然是讨论国际背景，就不应当忽略以下两点，在盛世才与苏联密切合作的前期，借助平息马虎山、麻木提起兵反抗省政府的军事行动之威，有一个将英印及土耳其、阿富汗等国势力全面逐出新疆的清洗过程，这是苏联全面控制新疆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苏联对新疆紧抓不放，不仅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国共两党与苏联，以及美国、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日本势力的涨消，对新疆问题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对此加以特别的关注。

总之，早期的研究成果虽属起步阶段，但多为谙知内情人士所写，当时人记当时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立论也较客观冷静，很多论断已逼近事件的本质，对当今研究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视野和深度逐步拓展，学者们从各种回忆录和档案材料中不断发掘，充实论点，从革命史、地方史、国际关系史和军事史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一事件，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结论，部分结论重新向早期论断回归。但限于种种原因，客观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并不多见，尤其对军事方面的内容，缺乏细致的梳理和推导，很多既定说法存在问题，有必要继续研究和探讨。

【论 文】

“援伊计划”相关问题研究

文志勇¹

摘要：1944年11月7日，在新疆伊犁专区中心所在地伊宁，继巩哈暴动之后，又掀起了一场地方民族与苏联军队共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经过一周激战，他们完全夺取了伊宁城，将驻防国民党军与汉族地方官民8000多人围困在城外艾林巴克高地。新疆省军事当局为解救伊宁被围守军，夺回丢失地盘，消灭暴动武装，恢复统治秩序，制定并实施了“援伊计划”。本文详细讨论了援伊计划的内容、实施及其后果。对学界流行的“五路援伊”之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疆；伊犁；三区革命；军事争夺；援伊计划

1944年11月7日，在新疆伊犁专区中心所在地伊宁县，继巩哈暴动之后，仍然是在苏联的策动下，又掀起了一场地方民族与苏联军队共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经过一周激战，他们完全夺取了伊宁城，将驻防国民党军与汉族地方官民8000多人围困在城外艾林巴克高地。新疆省军事当局为解救伊宁被围守军，夺回丢失地盘，消

¹ 作者为民族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教师，从事西北民族文献及历史研究。

